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9/342
S/1994/1007
29 August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152
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
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九年

秘书长的报告

秘书长谨向大会各成员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转递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庭长根据国际法庭《规约》第34条(见S/25704,附件)提交的第一次年度报告,《规约》第34条规定:“国际法庭庭长应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交国际法庭年度报告。”

* A/49/150

送 文 函

1994年8月17日国际法庭庭长给
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谨依照《国际法庭规约》第34条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交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的第一次年度报告。

主席

安东尼奥·卡塞西(签名)

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
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
国际法庭的年度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摘要		7
<u>第一部分</u>		
导言	1 - 51	9
一、国际法庭的设立	1 - 8	9
二、国际法庭的主要特征	9 - 27	11
A. 国际性质	10	11
B. 国际法庭的主要目标	11 - 18	11
C. 国际法庭的适用范围	19	13
D. 国际法庭管辖权的非专属性质	20	13
E. 被告	21	14
F. 国际人权条例的影响	22 - 26	14
G. 国际法庭任务的复杂性	27	15
三、干扰国际法庭设立和运作的主要问题	28 - 51	15
<u>第二部分</u>		
国际法庭的主要活动	52 - 164	20
四、通过程序和证据规则	52 - 97	20
A. 导言	52 - 57	20

目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B. 司法程序的基本特点	58 - 67	21
1. 合乎法律程序,特别是嫌犯和被告的权利 ...	58 - 40	21
2. 程序的大纲	61 - 67	22
C. 程序的基本要素	68 - 97	23
1. 国际法庭工作的集体领导	68 - 70	23
2. 诉讼辩论制度和调查制度	71 - 74	24
3. 明确的程序	75 - 83	25
(a) 行为模式	76 - 77	26
(b) 保护证人	78 - 83	26
(一) 证词	79	27
(二) 隐蔽证人身份的措施	80	27
(三) 受害人和证人股	81	27
(四) 性侵犯	82 - 83	27
4. 需要国家的合作.....	84 - 89	28
(a) 国家给予合作的义务	84 - 86	28
(b) 国际法庭的优先性	87 - 89	29
5. 被告或其所属国家设法规避国际审判的 案件	90 - 94	30
6.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95 - 97	31
五、通过拘留规则	98 - 116	31
A. 独特的国际性质	98	31
B. 基本原则	99 - 100	32

目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C. 另一套目的明确的规则	101 - 104	32
1. 拘留犯	102	32
2. 民族群体	103 - 104	33
D. 主要关切的问题	105 - 113	33
1. 拘留犯的权利	106 - 111	33
2. 安全	112 - 113	34
E. 与东道国监狱的关系	114	34
F. 拘留所管理当局	115	35
G. 视察	116	35
六、设立书记官处及其职能	117 - 138	35
A. 导言	117 - 119	35
B. 行政和财政管理	120 - 125	36
C. 为国际法庭提供服务	126 - 129	37
D. 保护、辅导和支助受害人和证人	130 - 132	38
E. 指定律师	133 - 138	39
七、检察官办公室人员编制及其活动	139 - 164	40
A. 导言	139 - 142	40
B. 检察官办公室的结构和运作	143 - 156	40
1. 有关人员编制的问题	143 - 149	40
2. 检察官办公室的结构	150 - 155	42
3. 与其他机构合作的需要	156	43

目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C. 同其他机构和国家的关系	157 - 163	43
1. 专家委员会	157 - 158	43
2. 同各国的接触	159 - 161	44
3. 同非政府组织的接触	162	44
4. 与大众媒介的接触	163	45
D. 结束语	164	45

第三部分

联合国会员国的行动	165 - 188	45
八、东道国的合作	165 - 167	45
九、总部协定	168 - 171	46
十、法律执行的生效	172 - 182	47
十一、各国的自愿捐款	183 - 188	48

第四部分

结论意见	189 - 198	49
附件		54

摘 要

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的这份年度报告所涉期间为1993年11月17日至1994年7月28日,报告评述国际法庭在这段期间完成的工作以及它无法完成的工作。

国际法庭由三个机构组成:司法机构,包括11名法官,分派到两个审判分庭和一个上诉分庭;检察官办公室,由检察官主持;以及书记处,由书记官长主持。

11名法官由大会在1993年9月选出,并于1993年11月17日履任。一名代理书记官长由秘书长在1994年1月指派。一名指定的检察官由安全理事会在1993年10月21日任命,但他表示在1994年2月之前无法履任。后来他又在1994年2月通知秘书长说,他无法接受任命。直至1994年7月8日安全理事会才任命一名新的检察官。

因此,尽管法官们和代理检察官在获任命以来的几个月内完成了许多工作,但负责倡议和进行调查和起诉的检察官办公室已因长期拖延任命检察官而陷于瘫痪。虽然如此,代理副检察官还是能够在建立必要的基本设施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

国际法庭,特别是检察官办公室和书记官处的工作也因供资安排不令人满意而受阻挠,这种安排特别妨碍工作人员的征聘。

法官们推选出一名庭长、一名副庭长和两个审判分庭的各一名分庭主审法官;确定所有分庭的组成;拟订《程序和证据规则》被视为是为国际刑事法庭起草的有史以来第一份详细的规则,以及拟订等待审判或上诉

的人员的拘留规则。法官们也处理各种各样较小的问题,从核可国际分庭审判室及其拘留设施的设计到国际法庭印鉴的设计等问题。

检察官办公室必须自我创新。1994年初从一无所有开始,首先是拟订一份员额表,并聘请有经验的合格人员。接着发展出一套资料管理和诉讼支助制度。然后综合、登记和分析大部分由根据安全理事会1992年第 780 (1992)号决议设立的专家委员会提供的各种各样与国际法庭管辖权有关的资料。结果,现在已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调查工作;与专家委员会建立和谐的工作关系确保继续不断地开展工作并充分利用该委员会开发的资源。继调查员的工作之后,检察官任务的最后阶段从草拟诉讼要点以及其后的整个审判过程开始。

国际法庭书记官处履行一系列独特的职责:国际法庭的行政和服务;与其他组织相同的核心行政职能;以及在刑事法院管理方面提供支助,这是一项复杂而高度专门化的功能。此外,书记官处还有与国家和其他司法机构无关的任务;负责设立一个单位以协助受害人和证人;负责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援助制度,包括指派律师;同时也负责拘留所的日常行政工作。

至今,在部署书记官处的工作人员及为受害人和证人股建立框架方面已大有进展。此外,书记官长已发表一套关于为被告指派律师的正式准则。

第一部分

导 言

一、国际法庭的设立

1. 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以下称为“国际法庭”)是安全理事会在1993年设立的,其目的在于以司法途径解决该地区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问题。安全理事会1993年2月22日通过的第808(1993)号决议原则上达成协议。应第808(1993)号决议的要求,秘书长在60天内提交了一份载有《规约》的报告,安理会在1993年5月25日第827(1993)号决议内一致通过该《规约》。国际法庭的11名法官由大会在1993年9月选出,并于1993年11月17日履任。

2. 尽管国际法庭成立以来只是一个很短的时期,但已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就职会议于1993年11月-12月举行,当时法官们宣誓就职,一般性辩论也开始进行,特别是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辩论;1994年1月-2月举行的第二届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国际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1994年4月-5月举行的第三届会议通过了《拘留规则》,其中规定拘留将要出庭的被告的条件,连同《关于为贫困的被拘留者指派律师的准则》;1994年7月举行的第四届会议审议了审判开始前所需其他实际安排,以及其他行政问题,例如编写和通过本报告。

3. 联合国和国际法庭本身迅速完成其各自在设立国际法庭及安排其业务方面的作用,突出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国际法庭在现代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是联合国有史以来设立的第一个国际刑事法庭。记忆所及,其前身只有纽伦堡和东京的军事法庭,这两者都是在极为不同的环境下设立的,而且都以基本上具有不同性质的道德和司法原则为依据。

4. 设立国际法庭是在司法方面回应前南斯拉夫局势的需求,据报该地有人犯下大规模惊人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这是国际法庭打算审判的两类罪行。关于国

际法庭是否适合判决战争罪的问题,这方面的一位极有权威的人士罗林指出:

“正是由于战争罪违反战争法,而战争法又属于国际法,国际法官应审判这些国际罪行。他是最有资格这样做的。”¹

国际法庭适合审判危害人类罪也正是由于这些罪行的本质:最近,有一个法国上诉法院,后来又有最高上诉法庭在巴里一案中正确指出“危害人类罪并非只是属于国内刑事法的范畴,而且也受制于国际法刑事法制度,这种制度与国界概念及因而引起的引渡法则完全不相干。”²

5. 作为国际司法方面最新设立的机构,国际法庭必须面对许多实际的未知之数,而事实上,也要面对人们对其法律基础和效能的质疑。国际法庭未曾因这些未知之数 and 反对意见而偏离其追求的目标;相反地,它致力于解决本身职权范围内的所有这些问题,并在涉及国际法庭职权范围外的事项时促请其他各方本身采取的适当行动。

6. 对于某些人来说,最基本的未知因素就是设立国际法庭的方法问题。在通过安全理事会第808(1993)号决议之前,联合国曾在许多场合就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的野蛮而残忍的性质进行辩论。1992年10月,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设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根据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其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的证据向秘书长提出结论。

7. 安全理事会在1993年2月决定设立一个独特的法庭。由于这个地区迈向和平的步伐缺乏进展,也由于必须向国际社会显示出联合国在成千上万人遭野蛮虐待和屠杀时没有袖手旁观,安全理事会在第808(1993)号决议内要求秘书长提出各种方案以求“迅速而有效地执行”关于设立国际法庭的决定。因此,人们认为,通过条约来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传统办法太缓慢(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充分批准),而且也不能充分发挥效能,因为无法强迫各会员国违背意愿批准这样一项条约。相反地,安全理事会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赋予的特别权力,着手设立国际法庭。

8. 迄今为止,筹资问题对国际法庭的设立及其运作的实际影响最大。为使国际法庭能够有效开展工作,其所需预算经费的所有方面都必须确定下来。不过,国际法庭目前是在临时预算和1994年12月31日期满的委托权力的基础上开展业务的。本报告其他部份将讨论因此而给国际法庭造成的人员编制和其他长期承诺方面的问题。

二、国际法庭的主要特征

9. 国际法庭的一些基本特点突出地显示出它不但有别于以往的战争罪行法庭,也有别于解决国际争端的任何其他机制。

A. 国际性质

10. 第一,与纽伦堡和东京法庭不一样,国际法庭的的确确是国际性的。有人曾正确指出,纽伦堡和东京法庭是“多国法庭”,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个国际法庭”³,因为它们只代表国际社会一部分:战胜国。纽伦堡法庭本身曾在其判决中承认这一点,它指出,在设立纽伦堡法庭和确定其执行法律时,其宪章的四个签署国“共同执行它们可能可以单独执行的工作”、“换言之,在纽伦堡,四个战胜国中的每一国本身都可以审判被告;它们宁可设立一个联合法庭,同时代表所有四国行事。东京法庭也是如此(尽管当时盟国最高统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派的法官是来自日本军事活动的11个受害国的公民,即日本投降书的九个签署国,再加上印度和菲律宾。相反地,国际法庭不是一个国家集团的组织;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组织。国际法庭的法官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带来了执行这项复杂任务所需的广阔的视野和广泛的经验。国际法庭不受各国法规、程序和司法的约束。就连扣留等待审判者的拘留所也是国际性的,不在东道国的控制和监督之下。

B. 国际法庭的主要目标

11. 国际法庭的宗旨载于安全理事会第808(1993)号决议,更详细的内容则载于

安全理事会第827(1993)号决议。宗旨有三：伸张正义、制止进一步罪行、并促进恢复和维持和平。

12. 第一项目标载于安全理事会第827(1993)号决议序言部分，其中除其他外还指出，国际法庭要将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罪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

13. 第二项目标也载于第827(1993)号决议，其中指出，设立国际法庭“有助于确保停止此种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和作出有效补偿”。安全理事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建立一套司法程序来劝阻冲突各方不要继续从事进一步罪行。希望通过将那些被指控屠杀和同样明显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绳之于法可以阻止交战者和平民不从事进一步的暴行。简而言之，国际法庭意在有力制止所有当事方继续参与残忍行为。

14. 安全理事会第827(1993)号决议和大会追求的第三个目标是“有助于恢复与维持和平”。作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的措施，鉴于安全理事会第827(1993)号决议确定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国际社会被视为是旨在逐步促进停止武装对抗及恢复正常的措施之一。

15. 有人唯恐设立国际法庭会伤害和平进程。事实上，国际法庭将创造条件使得较易恢复正常，从而有利于和平进程。如果我们允许罪犯逍遥法外，又如何能希望在独立国家内或在它们之间恢复法治并使各民族集团发展稳定，积极而健康的关系呢？因其罪行而直接或间接受害的人是不会宽恕或消除其怨恨的。一个曾遭异族军人强奸的妇女，或一个父母或子女被残忍杀害的平民如果了解到犯罪者逍遥法外，并且还可能在从事惊人行为的同一城市内自由行动的话，他们又如何能满足要求报复的心愿呢？满足这种报复心愿的唯一文明办法是主持正义：由一个真正不偏不倚的独立法庭进行公平的审判，并惩罚有罪者。如不进行公平审判，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汹涌沸腾的仇恨和憎恶心理迟早会爆发出来，导致新的暴行。

16. 强调国际法庭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会过份。国际法庭绝不是复仇的手段，它是促进和解和恢复真正和平的工具。如果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罪行

不由个人负责,则整个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就要对这些罪行负责,并打上罪犯的烙印。换言之,“集体责任”这一原始而古老的概念将占上风;结果,整个集团将会因屠杀、拷打、强奸、种族清洗、任意破坏城乡而被判有罪。宗教史明白地显示出,死抱“集体责任”的看法很容易会变质为愤怒、仇恨和挫败,并必将导致更多的暴力和新的罪行。

17. 设立国际法庭无疑应被视为一种措施,其目的在于维护正义,办法是:以有利于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各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建立健康的合作关系的方式主持正义。

18. 总而言之,认为国际法庭是以虽然地塌,也伸正义这一古老的格言为依据的假设的是错误的。相反地,国际法庭以黑格尔在1821年提出的名言为依据:伸张正义,以免地塌。⁵事实上,司法程序旨在避免冲突和紧张局势的加剧和恶化,从而逐步促进实现持久和平。

C. 国际法庭的适用范围

19. 国际法庭的管辖权与纽伦堡和东京法庭的管辖权有两个基本方面有不同之处。第一,国际法庭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特别是灭绝种族罪有管辖权。危害和平罪不在国际法庭的范围之内。重要的理由可能在于,安全理事会宁可自己保留处理侵略及类似危害和平罪方面问题的职权。第三,纽伦堡和东京法庭只审理一场国际武装冲突过程中犯下的罪行,而国际法庭则有权判决国家间战争和国内战争过程中所犯罪行。

D. 国际法庭管辖权的非专属性质

20. 设立纽伦堡法庭是为了代替国际法院审判重要战犯,这些战犯的罪行“没有特定的地域位置”,⁶国家法院要负责复查诉讼程序,各国法院在这些程序内将次要罪犯和纽伦堡法庭判定有罪的各组织的成员绳之以法。同样地,东京法庭旨在取

任何国家刑事法院。与此相反,国际法庭并不垄断对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犯下的某类罪行的刑事管辖权。国际法庭无意剥夺各国家法院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刑事管辖权。不过,如下文所述(见第87至89段),只要证明有利于伸张正义,国际法庭有权在任何阶段干预并接管国家诉讼程序。

E. 被告

21. 纽伦堡和东京法庭的《规约》规定惩罚犯罪组织。目的在于确定,如果判定一个组织有罪,其后在战胜国较小(国家)法庭的诉讼程序内可能判定个别成员有罪。相反地,无论是组织、或法人、或国家都不得交由国际法庭审判、诉讼程序只以个人为对象。在国际人道主义法内,“集体”责任的概念日益屈服于个人责任的观念。

F. 国际人权条例的影响

22.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⁷和1966年的两项国际人权盟约⁸并非徒然无效:国际法庭明确地体现出1945年后时期的人权问题。人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人权标准对国际刑事法的拟订工作产生有益而巨大的影响。这些标准从两个方面反映在国际法庭的《规约》和《程序》内。

23. 第一是绝对尊重“平等手段”原则(原告和被告地位平等,机会均等),特别是充分维护被告的权利,包括以任何途径获得律师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四条,第1和第3段)。

24. 第二,被告有权派代表出庭。这一条件的根据也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四条,第3(d)段)。

25. 第三,国际法庭无权强加死刑(1989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号任择议定书》,旨在废除死刑⁹)。

26. 第四,有权就《规约》内的决定提出上诉。为使被告或原告能提出上诉,而

又不会给国际法庭的结构造成麻烦,国际法庭分为两个审判分庭,各有三名法官,以及一个上诉法庭,由五名法官组成。这种基本保障正义的做法的根据是《公民权利的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内所具体规定的审查权利(第十四条,第5段)。

G. 国际法庭任务的复杂性

27. 除了设立一个新国际机构通常需要的所有步骤外,国际法庭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编写刑事诉讼法典(即其程序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半立法任务以及其各项活动的行政和管理工作。这包括各式各样的任务,例如提供法律援助、指派律师、提供整套国际程序服务、设计和建造审判室和拘留所、适用于被拘留者待遇的规则和条例、保护证人、安排交通运输证人到法庭以及全面保护法官的安全,以上只是略举一二。

三、干扰国际法庭设立和运作的主要问题

28. 尽管设立国际法庭的速度和诚意,它存在的最初几个月却遭遇到几个重大的困难。其中有些问题是国际法庭有能力解决的,并且它也在努力解决;其他的问题就不在它的控制之内了。

29. 这些困难可以分为三类:现实的、财政的和结构的。

30. 国际法庭在其创立之初就面对这一些似乎是永无止境的现实问题。它本来应当是一个全新的组织,从一个35页报告的纸上组织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国际司法和执法机关。为此,它需要法官、检察官、书记长官、调查人员和支助人员、相当全面的口译和笔译建制、一个由法庭提供的法律援助结构、房地、设备、法庭、拘留设施、看管人员和与这些有关的所有经费。

31. 当各位法官于1993年11月17日在海牙第一次开会时,他们只有从国际法庭总部的和平官自卡奈基基金会借来一个会议室和另外三个办公室。联合国秘书处的法律事务司提供了两位法律事务专员,为各位法官服务,另外还有就地雇用的四名短

期秘书。当时国际法庭没有自己的工作地点,也没有长期工作人员。此外,安全理事会任命的检察官在接受他的任命时有一个附带条件,那就是他将从1994年2月初开始担负任务;这当然就是说,在那之前他不能设立办公室和开始进行调查。除此之外,还不能确定国际法庭的地址是不是设在海牙。最后,由于大会没有作出适当的财务安排,秘书长只好决定在个案的基础付给法官薪金,不过只付到1993年12月31日为止。

32. 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请法官将他们的工作局限于从事正式工作安排,包括选举庭长、决定各分庭的组成(两个审判分庭和一个上诉分庭):在完成了这些工作以后,国际法庭就宣布解散,直到大会就预算问题作出正式决定,提供绝不可少的起码基础设施。但是,为了不让宝贵的时间轻易浪费,并且也不顾完全缺乏工作人员和财政来源,法官们决定着手进行那些为最后达到国际法庭的目的的工作。

33. 因此,法官们立刻开始深入讨论各项与他们的工作不可分割的第二项立法的原则,这就是他们必须通过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参看下面第二部分,第一章)。此外,他们采取的所有必须的步骤来加速建立国际法庭的进程。因此,除其他外,在秘书长和荷兰当局的坚定支持下,他们表示,在作出一些必要的改变和修正后,海牙可以作为国际法庭的适当地点。

34. 上面提到的许多问题是与国际法庭面对的财务困难紧密结合的。1993年12月,大会授权给秘书长,使他有权支配一笔为数560万美元的款项,所涉期间为6个月(1994年1月1日至6月30日),不过这要先得到预算和财政问题咨询委员会(行预咨委会)和大会第五委员会的审查和同意。

35. 这一笔非常有限的拨款造成了一个完全可以预见的、实质性的和不利的后果,那就是,它限制了国际法庭尽快成立的能力。由于拨款只有六个月,所以国际法庭无法作出超越1994年6月的长期承诺。就实际效果而言,这就是说,无法长期租用一个办事地点;尤其是一些将现有的建筑物改造为符合国际法庭具体需要的办公地

点的额外工作；国际法庭只能在短期合同的基础上雇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它选择能力；它无法购置和安装那些开始进行调查工作所需的设备。简言之，它无法全面投入。

36. 1994年4月，大会进一步提供了540万的拨款，并将期间延长到1994年12月，秘书长也得到特别授权，使他能够就建筑物和雇用工作人员作出更长期安排，从而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因此，国际法庭于1994年7月就一个建筑物签订了一份四年的租约。这使得国际法庭能够开始将办公空间改造为一个法庭以及所有与其有关的设施（这是任何审讯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并且开始整修检察官的办公室。但是，法庭最早也要等到10月中才能使用。此外，国际法庭的三个分庭只能使用一个法庭显然是不够的，可是这是目前只能承担的。现在也开始征聘工作人员，不过这中间也无可避免地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资深的一级，所以目前人手仍然不足，尤其是检察官办公室。还有，法官仍然是在个案的基础上支薪。

37. 在有关其他的实际问题方面，直到最近一直凌驾于其他问题之上的就是任命一位检察官。由于已经任命的检察官于2月退出的不幸事件，国际法庭在物色他的继承人上又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这对国际法庭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幸好国际法庭有一位忠心耿耿的副检察官，可是，根据章程和程序和证据规则，有些事必须由检察官负责。1994年7月，任命了李察德·戈斯顿先生为检察员以后，国际法庭的编制中已经得到最后的关键因素。

38. 国际法庭仍然面对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缺乏一个让它能进行日常调查和司法工作的法律框架。不过这是国际法庭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

39. 在这方面，国际法庭从事了一件在国际刑法领域中的创举，在短短的四个月中，它不但起草和通过了程序和证据规则，并且还起草通过了管辖拘留所的拘留规则。它还通过了关于指派律师的纲领和在书记处里制订了一个关于受害者和证人股的工作框架。

40. 正在为拘留所制订更多的内部规则，以管辖工作人员的行为、管训程序、

提出指控的程序以及任命检察机关。已经同东道国达成了若干项协定,包括《总部协定》和《安全和秩序协定》。

41. 各分庭都已经任命了分庭法官,并且还编制了审查起诉书的值班名册。已经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法庭的组成文件已经编制完成,准备出版,其中包括索引,并且已经为首次进行审判作出了大量的法律研究工作。

42. 在做完了它目前所能做到一切准备工作以后,法庭现在希望得到联合国各会员国的支持,以确保在其权力范围以外的事务都能够尽快解决,以便它能够履行托付给它的重要任务。

43. 除了国际法庭在存在之初遭遇到的许多政治、财政和后勤方面的问题以外,还应当提到的是它的成立在许多官方和非官方圈子里受到怀疑的情形,包括怀疑的主要内容和法庭的反应。

44. 对于设立国际法庭一事的批评,法庭不能代表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来反驳。国际法庭已经存在了,它获得授权去进行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而它也随时准备履行它的义务。但是,如果这些批评影响到它履行任务的能力或它履行任务的合法性,则必须面对这些批评,以便评估一下,国际法庭的任务是否是不可能完成的。

45. 国际法庭经常受到的一个批评那就是它无法强迫那些被控的罪犯接受的它的司法审判。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国际法庭最近通过了的程序和证据规则中找到。除了第59-61条中就潜逃的被控者的案件所规定的具体程序以外,以及对所涉国家为逮捕或遣送这些人到国际法庭的规则以外,国际法庭可以使用的办法还包括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并通过该理事会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所涉个人或国家阻碍国际司法的企图。

46. 另一个经常听到的批评是,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是有选择性的:它虽然对这件事建立了一个刑事法庭,可是它却没有在其他涉及大规模违反人权或灭族行为上采取同样的行动。

47. 当然,只有安全理事会才能决定,在何种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按照《宪章》第

七章的规定,建立一个刑事机构对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审判。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建立国际法庭是一个划时代的先例,希望国际社会在将来有需要时以完全公平的办法伸张国际正义。对那些批评安全理事会的制裁是“选择性”的人,可以指出的是,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是值得欢迎一步,可以作为一个将来在其他情况下可以采用的模式。素为人知的是,国际社会采取的途径不同于市政府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时常一个新的法律体制的创造不是由于有一个复杂和全面包容性设计,而是由于具体情况所产生的压力。如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所说,国际法“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世界变化的需要而不断作出适应的”。¹⁰每当一个新的体制建立之后,只要它有用和能够产生结果,它就可能造成滚雪球的效果。

48. 最后,还应当指出,许多对国际法庭存有疑虑的人指出,无论如何,国际法庭永远无法将那些领导人绳之以法,这是指那些在前南斯拉夫负责规划或下令进行大规模违反人权主义法的行动的人,或者那些不去阻止这些行动或惩罚这些行动的肇事者的人。

49. 这个反对意见的假设是,国际法庭将无法将那些按照其规约应当被控犯有战争罪行或危害人类罪行的人带到法庭受审。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国际法庭将对检察官提起控诉并得到一名法官批准的任何人、无论其地位和官阶,执行法律。在实际上的障碍可能阻碍履行这项任务时,国际法庭将会依靠安全理事会去采取任何有助于充分完成其司法行动的步骤。

50. 另一方面,也不应当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从被害者的角度来看,最切要的是将他(她)所遭到的不人道的待遇公之于世,而使实际上从事这种罪行的人接受审判,并且在证明有罪时予以处罚。

51. 对那些受到强奸、种族清洗、酷刑、灭族行为或任意破坏财产等罪行的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亲人)而言,能够将那些实际上从事这种野蛮行为的人在一个公平的法庭中绳之以法至少是部分消解他们的痛苦和愤慨的办法。对这些被害者而言,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是否应当对酿造或纵容这种罪行的发生负一些责任可能比较

不重要。“发号施令者的负责”主要是国际社会上的迫切关切,因为这种“系统性的罪行”——也就是说,决策者涉及普遍而有系统地罔顾人权的行为——也应当受到惩罚以便消除在所涉国家的国际罪行的根源。

第二部分

国际法庭的主要活动

四、通过程序和证据规则

A. 导言

52. 程序和证据规则为国际法庭的三个机关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结构,这三个机关分别是分庭,包括:两个审判分庭和一个上诉分庭,从事审判程序;检察官办公室,负责进行调查、起诉、审讯和上诉等工作;和书记官长办公室,负责提供对整个国际法庭的行政支助。

53. 除了规则以外,法庭的法官还设法表现国际法庭的国际性质。只有获得广泛的协议的措施才会获得通过,从而落实普遍在国际上被认为是公平的和正义的概念。在解释规约时,法庭也设法在严格地依照法律条文解释的法系同以达到执法目的的法系之间取得平衡。

54. 国际法庭在国际法里具有一个独特的性格,没有多少可以指引它的前例。在它以前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一个在纽伦堡,一个在东京,都只有非常简陋的程序规则:纽伦堡军事法庭的程序规则还不满三页半纸,总共才有11条,并且所有程序问题都是由法庭的个人决定予以解决;在东京,只有9条程序规定,这些规定成为法庭规约的一部分。所有其他事务都是在个案的基础上由法庭自行裁决。

55. 各位法官于1993年11月开始起草国际法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并且对纳入这些规则的概念进行一般性辩论。这使得法官们在各次讨论之间从事编写工作,完成了供讨论之用的一份完整的规则草案。经过广泛的辩论和修订,这份一共125条的

规则于1994年2月在第二届会议结束的时候获得通过。法官们在这项工作中还获得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厅成员的协助。他们还获得许多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所提出的建议的协助。

56. 国际法庭之所以这么迅速地进行这项工作主要是基于四项理由。第一,法庭觉得,它有尽快进行工作的道义负责。所有各方,不论是受害者或罪犯,不论是当地的参与者或远在四方的观察者,都能看到,这种公然侵害人权的行为是不能够不受惩罚的。尽早进行审判还可以发生遏阻作用。第二,检察官在没有得到这些规则所提供的指引和框架以前无法充分执行他的负责。第三,法官们认为,这些条例可以帮助各会员国,使它们能够制订或修订它们国内的立法,以便符合法庭的规约和安全理事会第827(1993)号决议,以及同法庭在所有各方面的业务和司法程序中合作。最后,就在法庭通过这些规则而开创新天地的时候,法官们认为,这些规则的早期出版将会使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关心的团体对这些条例作出比较详细的评论,并就可能作出的改善提出意见,以供法庭在实际开始工作以前加以考虑。

57. 为了能够适当地进行司法活动,通过明确而详细的规则,以此管辖司法程序中的主要方面和为被告的权利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是很重要的。因此,程序和证据规则的安排反映了司法程序的实际步骤,以协助在法庭受审的被告和他的律师。此外,已经作出一切努力,使规则的条文明白易懂。

B. 司法程序的基本特点

1. 合乎法律程序,特别是嫌犯和被告的权利

58. 规约中包含了所有在保护人权的国际文书中所揭示的所有对进行一个公平而迅速的审判的基本保障,并且更具体地说,包含了《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14条。这一项极端重要的条款是特别为保护被告的基本权利而设计的。这些权利都已经在《法庭规约》第21条中加以重申。

59. 但是规约的起草者决定比上面提到的国际公约第14条更进一步,所以在规

约第18条第3款中就审判前阶段的某些权利作出了规定,包括对尚未“被控”而只是“嫌犯”的人提供基本保障。按照该条规定,一名嫌犯有权获得律师的咨询,包括在当地取得免费的法律协助,以及有权获得从他能够听和讲的语言的翻译服务。法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向嫌犯(第42至45条)和被告(第62、63、65-68和72条)重申和扩大这些保障。

60. 规则中明白说明法律程序的原则和详细规定为确保根本上公平和实质上合法的保障。因此,规则中除其他外具体规定了“火力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指控者和被控者必须站在平等地位。检察官作为指控者并没有任何优势(第66-68条);有权取得律师的援助,有必要时可由法庭承担费用(第42条);有权让审判公开(第78条);被告有权检验检察官的证据和提出他自己的证据(第85条);无罪的假设(第62和87条);有权不自己认罪(第90条)。

2. 程序的大纲

61. 或许可以简单说明规约中所列的程序主要步骤,这些步骤在程序和证据规则有详细的说明。

62. 唯一能够开始司法程序的人是检察官,或者在他缺席时经他明白授权的副检察官。法庭的程序不能够由被称为被害人和他的代表发动,也不能由非政府组织或一个政府发起。检察官在自己主动收集证据或根据从个人(包括被害人)、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或其他来源收到的控诉、资料或报告后,可以发动此一程序。

63. 在发起这个程序时,检察官必须在有证据支持下提出控诉;此控诉应当向庭长预先指定的该月值班法官提出,以供审查。如果经过法官核可这项控诉原则上应予以公开。应检察官的要求,该法官然后可以发出逮捕命令或移交被告的命令,或者发出搜索令。国际法庭法官所发出的所有命令都是交给所涉国家的负责当局,由国家当局负责执行这些命令。

64. 在拘捕到案后,被告将转送到海牙,在拘留所中受到联合国的控制和监管。在到达后,被告会尽快送审判分庭,并受到正式指控。检察官必须向被告他表示手中所拥有的证据,而被告也需要表明他的证据。书记长官会应审判分庭的要求定出一个日期,然后审判时期开始。在审判中,告诉与被告双方将分别为检察官和被告律师;只有在作为替他自己辩论的证人时被告才会出庭和接受询问。个人、组织或政府可以在法官同意下提出书面或口头证词,作为法官的顾问。

65. 实际的审判过程如下:在所涉双方发表了开审的说明以后,检察官提出书面证据或证人的证据;被告律师可以询问证人;被告提出他的证据,而他的证人会受到检察官的询问。然后可以提出反驳证据。在提出证据后,两方各做总结辩论。此后,审判分庭法官会在摄影机前说明案情和公开宣布审查结果。如果被告被认为有罪,一个新阶段,也就是宣判,就此开始,在该阶段结束时分庭法官宣布判决。

66. 对判决可以在30天内提出上诉,上诉可由检察官或被告根据规约第25条提出。上诉法庭庭长在经过与审判分庭类似的程序后宣布作出必要的更改。

67. 如果被告所受的惩罚是监禁,这项惩罚将在那些向安全理事会表示愿意接受罪犯的国家服刑;具体的国家将由庭长指定。

C. 程序的基本要素

1. 国际法庭工作的集体领导

68. 秘书长的报告所草拟的《国际法庭规约》规定,国际法庭庭长可发挥很大作用。除在国际法庭不开庭时作出各项重大决定外,预期庭长在国际法庭召开全体会议时也可以在执行工作上发挥重大作用。

69. 应庭长的建议,国际法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定选举一位副庭长和组成主持人员。主持人员由庭长、副庭长和两个审理分庭的主审法官组成。主持人员负责作出一些决定和确定不必由国际法庭全体审议的行政问题。后来把一些相当重要的特定权力也给予主持人员。主持人员应特别负起决定法官提出放弃资格请求的

责任(第15条)。在任命副书记官长和书记官处其他工作人员(第31条)和与国际法庭的职能有关的各项重要问题(第23条)方面也要同主持人员协商。此外,主持人员根据国际法庭的《拘留规则》执行国际法庭即发的行政规则和细则时应发挥重要作用。

70. 国际法庭在工作上十分强调集体领导,其中有两项相关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国际法庭必须作出诸如与各国合作事项的行政决定。尤其在国际法庭最初展开活动时——早期很容易犯错误,这些关键决定应由国际法庭全体作出,如果在不开庭期间,无论如何应由一个以上决定。同样,国际法庭的组成具其特色:由法官、律师和学者构成,根据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来审理可能出现范围广泛的法律问题,由个人人权至国际法,由刑事起诉至上诉程序都包括在内。因此,把国际法庭的管理权交给由其成员组成的一个小组,比交给单独一人更为合适。

2. 诉讼辩论制度和调查制度

71. 按照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有限先例,《国际法庭规约》的程序大体上采取诉讼辩论制度,没有采用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流行的调查制度。既然没有调查法官负责搜集证据,则调查指控犯罪行为 and 取得必要证据的初期工作都要由检察官承担(第39至43条)。检察官提出起诉书,经法官同意后负责在分庭对该案进行辩论(第47、84和85条)。但是,检察方和被告方在审讯时是地位平等的:起诉书获得肯定后,被告方有权搜集和取得所有有关证据,检察方和被告方都必须提交所有文件和传唤证人。每一当事方都有权向另一当事方的证人作出反质。因此,被告的权利受到充分保障,创造了公正审讯的条件(第66至67条)。人们可以从《规约》和程序中看出,已经作出努力,以期避免一些经常提到的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弊端。

72. 但是,与一些诉讼辩论制度有三项重大差异。第一,正如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一样,并没有技术规则作为是否接受证据的标准。国际法庭不必受到从古老的陪审制度发展出来的限制规则的束缚。国际法庭没有陪审员,不必制止无关的辩论,也不

必就他们所听取的证据提供指示。对面前的证据具有提供证据的价值衡量完全由法官承担。因此,所有有关证据都可以在国际法庭提出,但是,如果确保公正审判的需要远远超过其提供证据的价值(第89条),或这些证据是在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取得者则不在此限(第95条)。

73. 第二,以一般的诉讼辩论制度而论,法庭必须以当事双方提出的证据为限,但是,国际法庭可以下令提出更多证据或接受自动提供的新证据(第98条)。这就可使国际法庭能够确保据以作出最后决定证据是令人满意的。人们认为,在国际一级,这一规定对法律有利,而当事双方的权利如有任何贬损,也是很轻微的。

74. 第三,程序中并未列入赦免和被告抗辩交易的惯例。完全由检察官决定如何起诉。被告在分庭中表现的合作态度也会作为量减刑罚的考虑(第101条),同时,庭长给予赦免或减刑时,也会予以考虑(第125条)。

3. 明确的程序

75. 国际法庭是一个临时机构,能够按照承担的任务来制订规则和程序。国际法庭独自负责审判人类有史以来犯下最应受到谴责的罪行,这些罪行并非在外国战场所犯,而是在其本身的家园犯下的,这些恐怖和野蛮行为是对其邻人犯下的。因此,国际法庭决定,在制订其程序时,应注意到前南斯拉夫武装冲突中的最显著事项。第一,事实上前南斯拉夫的事态并非仅仅两个敌对国家军队的对垒,不仅是具有严密指挥结构的有纪律军队或平民的对抗。反之,有几个当事方参与这一冲突,包括数国的正规军,民兵和准军事集团,显然不清楚谁控制民兵和准军事集团。第二,正在爆发自相残杀事件,由于种族和宗教冲突而更为恶化,由于群体间的仇恨结果造成种族清洗、种族灭绝、集体强奸和广泛地、大规模地违反人权的其他行为。再次出现的种族仇恨使朋友变成敌人,并且使古老的血缘关系远比人类大家庭和人格操守的标准更为重要。第三,这个区域发生无法容忍的强暴行为引起平民的广泛惊恐和深切愤怒。同时,目击发生大屠杀和暴行的人也许会深怕提出证词会对他们本人及

其家属带来不幸后果而不敢就这些罪行作证。因此,国际法庭的法官在起草《程序和证据规则》时特意把照顾到上述冲突各方面问题的规则列入,例如有关行为模式、保护证人和性侵犯方面的规则。

(a) 行为模式

76. 国际法庭将要对诸如蓄意谋杀、酷刑或强奸等危害人类罪行的指控展开审判,上述罪行是基于种族、民族、政治、人种或宗教原因广泛或系统地侵犯平民的罪行的一部分(参见《规约》第5条和秘书长的报告(S/25704)第48段)。国际法庭对这些控诉进行审判时,不仅要审查个别被告的行为,还要审查团体或军事部队或准军事部队的一般行为,以便确定据称在前南斯拉夫所犯的大规模罪行不是个别事件,而是较广泛的有系统行为的一部分;因而对是否接受涉及“行为模式”的证据方面具有重要性(第93条)。但是,关于确定这些证据在指控的犯法行为各项情节中的重要性则显然由法官决定。对于性侵犯方面的有关行为模式尤其重要,从而确定存在强迫方式,否定指称已获同意的任何说词(第96条)。

77. 如果要证明灭绝种族的一项基本条件——“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一个群体”——是否存在的话,这种证据也是十分重要的。简单地说,如果没有明确而具体地说明一种意图,则确定它存在的办法是调查群体或个人的一贯行为,以便决定这种意图是否源于“行为模式”。

(b) 保护证人

78. 法官很了解许多证人十分不愿意在国际法庭作证。指证犯罪者的主要证人常常受害,他会感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威胁。举例说,受害人可能还有家属留在同情被告的地区。因此,最令人关切的是,如何使证人毫无畏惧地作证。如果国际法庭要顺利地审判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及处于高位者,则这方面便特别重要。这些问题将由下列方法来解决。

(一) 证词

79. 在特殊情况下,检察方和被告方可以通过证词的方式提出证据,即提出不能或不愿往后在公开法庭作证的证人的供词(第71和90条)。如果后来证人失踪,国际法庭如能根据这种证据进行审判,则这种办法就更为有利。证词可以在当地书写,在适当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录象访谈的方式制作(第71条)。为了保持“公正”(特别是要保护被告的权利),在提出证词的程序中可向证人反质。

(二) 隐蔽证人身份的措施

80. 另一种保护办法是:如证人会有危险,则要到国际法庭对证人提供保护后才向被告说明证人身份(第69条)。还可以酌情保障证人的公职身份(第75条)。

(三) 受害人和证人股

81. 《程序》中有关保护证人的最重要规定是在书记官处设立受害人和证人股(第34条),这是国际法的最重大创新。法官从来不会忽略受害人和证人应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力。国际法庭设立了一个特别股,负责提供咨询服务,不仅就法律权利方面提供服务,而且提供心理方面的协助和支持,并酌情建议保护措施。由于这个股主要是处理被强奸和进行性侵犯的受害妇女的问题,因此,这个股随时雇用合格的妇女。

(四) 性侵犯

82. 国际法庭确认到,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有许多受害人是妇女,因此,《程序》中特别强调对妇女所犯的罪行。《程序》一般提到性侵犯,没有具体提到强奸问题;《程序》又对证据标准和证人的可信度--被告方可能提出问题--作出特别规定(第96条)。

83. 特别是在性侵犯方面没有规定对受害人的供词要求加强证据。与受害人从前的性行为无涉,并且不接受这些问题。如被告方提出表示同意的问题,国际法庭可注意证明表示同意之说不成立的因素,其中包括使用暴力和身心压迫办法。

4. 需要国家的合作

(a) 国家给予合作的义务

84. 众所周知,联盟国设立纽伦堡和东京法庭时,已经全面管辖和控制德国和日本的领土,此外,审判开始时已经逮捕了被告。因此,上述法庭不需要被告所属的国家当局给予合作,检察官进行调查和搜集证据时也不需要其他国家当局的合作。但是,国际法庭的情况完全不同。当安全理事会设立国际法庭时,深切注意到对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没有任何直接权力,对继承前南斯拉夫的共和国尤其没有任何直接权力。因此,国际法庭并无直接执行权力;它没有可以在联合国会员国领土进行调查、传唤证人或发出逮捕证的任何执法人员。要执行这些任务,则国际法庭必须依靠每一个国家的国内司法系统和执行机构。因此,国际法庭发出的逮捕、搜查、交出或移交人员的请求都交给有关国家的市政系统,并由其执行。关于这方面,必须强调的是,所有国家都有与国际法庭合作和遵从其请求及命令的严正义务。《规约》第29条已经就这种义务作出有力的规定,而国际法庭是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决定设立的。因此,按照《宪章》第二十五条,该项决定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

85. 简单地说,为了履行此种义务,所有国家都必须执行旨在使其市政司法系统满足《规约》的规定的法律。正如下文第三节第3部分所说明的,一些国家已公布了这种法律,别的国家则尚在通过这种法律的过程中。

86. 程序再次说明《规约》所规定的各国的责任,即国际法庭发出的逮捕证或任何其他命令应及早执行,并且再次指出,国家有责任消除其国内法产生的任何法律障碍,以便把被告交出(第56和58条)。国际法庭可以提请国家提供其在调查或诉讼过程中取得的任何资料,根据《规约》的规定,该国必须交出所请的资料(第8条)。

如果一国不颁布执行法律或拒绝合作,可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第61条)。这方面对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和任何其他国家都适用。如果需要采取这一步骤,则国际法庭将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国际一级给予支持。

(b) 国际法庭的优先性

87. 已经指出(参看上文第20段),《规约》规定,国际法庭对其提出起诉和审判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没有专属管辖权。反之,国际法庭与国内法院对同一罪行享有并行管辖权。事实上鉴于可能出现的案件数目极大,同时,许多被告发现所在国当局愿意和准备绳之以法,因此,认为如果国内法院根据其法律或按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行使其管辖权是值得欢迎的。

88. 为求避免并行管辖权可能出现任何不利后果,《规约》列入一罪不二审原则时作出下列规定:

(a) 如果某人受到国际法庭审判,则不应再次受到国内法院的审判;

(b) 同样,除两种特例外,某人受到国内法院审判后,不应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

这两种特例是:某人作出属于国际法庭管辖范围内的行为受审时,国内法院定为一般罪行,或“国内法院的诉讼程序不公正或不独立,而且目的在于包庇被告,使其免除承担犯有国际罪行的责任”,或该案件没有进行“细致的起诉”(参看《规约》第10条第2款b项)。在这两种情况下,一罪不二审的原则就不适用,国际法庭可对被告再次审判。

89. 国内法院和国际法庭的并行管辖权有一项条件,即根据《规约》(第9条第2款)的一项基本规定,阐明国际法庭优于国内法院的原则。上述条款阐明,检察官可以要求国家当局对在该国进行调查或刑事诉讼的案件提供资料(第8条),同时,他可以酌情请审判分庭发出命令,延迟执行国际法庭的管辖权(第9至11条)。又因为国际法庭具有优先性,得在国内法院诉讼的任何阶段决定介入,并从国内法院手里接管该

案件。

5. 被告或其所属国家设法规避国际审判的案件

90. 国际法庭的法官最了解在被告潜逃,较可能发生的是国家拒绝交出疑犯时——因为该国已决定不予合作,更具体地说,认为与其本国的法律规定不符——会产生的实际困难。因此,关于对不出庭受审者制订条款以及必须保护正当程序和审核的权利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鉴于一些原因,国际法庭已作出结论,不应在程序中列入此种条款。

91. 这并非说违背者可以逍遥于国际法院管辖权之外。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规约》规定联合国会员国负有同国际法庭合作的明确义务,并应遵行其命令,包括逮捕或拘留疑犯的命令。这些义务优于有碍交出或移交被告的任何国内法,包括任何有关引渡的条约或国内法。因此,国际法庭制订了一些规则,其确实目的在于处理因被告潜逃或其所在国家当局拒绝逮捕或将其交出而不能对被告进行审判的情况。下文简单说明这些规则。

92. 一俟国际法庭法官同意起诉后,将对被告发出逮捕证,送往被告居留或据悉最后停留的国家。如该国无法执行逮捕,必须通知国际法庭。如在适当时间内未向国际法庭提出报告,则视为未执行逮捕,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得采取一切合作办法,通知被告已提出起诉,包括在合适的报纸刊登通知(第54至61条)。

93. 如采取这些措施后,被告仍未出庭,或天向国际法庭投案,则起诉书将交给审判分庭复核。此时起诉书和所有佐证证据将交给公开法庭。如审判分庭认为具有初步证据的案件成立,则应发出一份国际逮捕证,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转交所有国家。此外,如审判分庭认为未执行逮捕是由于某一国家不与国际法庭合作所致,则庭长应通知安全理事会(第61条)。

94. 这些措施表明国际法庭根据《规约》对应对所犯罪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的决心。

6.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95. 非政府组织可以马上提供协助的一个领域是供给资料。非政府组织在查明发生属于国际法庭管辖范围内的事件、追踪证人和在可能情况下向检察官提供直接可用证据方面都可发挥宝贵作用。

96. 鉴于有待决定的法律问题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因此,国际法庭在程序中作出规定,法庭发出许可后,让法庭之友出庭(第74条)。这样不仅使国际法庭能够取得独立专家就任何问题提供其所希望获得的意见,并且可让各国和非政府组织等其他当事方提出意见。

97. 非政府组织能够协助国际法庭的另一方面是对受害人和证人给予支助。现有的组织能够提供较佳实际协助,不管是财务、心理还是专业的协助,比让当前缺乏所需人力和财政资源的司法机构来办理这种任务好得多。更具体地说,非政府机构可以在审判前和审判后对受害人和证人提供心理上和实际上支助。这方面可以对国际法庭本身的受害人和证人股的工作发挥很有用的补充作用(参看上文第81段),该股只能在审判被告前受害人和证人在海牙的有限期间提供所需的心理和法律咨询。

五、通过拘留规则

A. 独特的国际性质

98. 国际法庭势必必须采取创新的办法行事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已制订了一套拘留办法,用于拘留作为被告出庭受审的人员。这将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被告被留置在一个特别的拘留所,非属国家拘留规则(不论是军事还是民事的)管理下,而是在国际法庭明确建立的一套独特国际标准制度管理下,被告将在这个法庭上受审。为此目的,国际法庭于其1994年5月5日第三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国际法庭等待审判或上诉、或其他方面经法庭授权拘留的人员的拘留规则(“拘留规则”)。

B. 基本原则

99. 国际法庭在起草拘留规则时,考虑到联合国所建立作为各国基本准则的现行一套国际标准。它因此参考了1977年《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88年《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和1990年《囚犯待遇基本原则》。国际法庭还尽可能考虑了欧洲委员会1987年颁布的《欧洲监狱规则》所建议的较高标准。拘留所设在荷兰,为的是接近国际法庭之所在,并且为了安全的理由,实际设在政府的一间监狱之内,但当然是在联合国的完全控制和监督之下。因此国际法庭致力确保为拘留所拟订的办法同荷兰监狱制度所有相关方面都相符合。

100. 拘留规则有三个基本原则。首先,不论被控告罪行多么严重,所有等待审判的人员均须被假定无罪,直到被判定有罪并且加以如此对待时。其次,必须充分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这意味除其他外,在拘留所中必须所有时候都受到人道待遇,并且必须满足他们所有的基本身体、道德和精神上的需要。第三,在所内不得施行也不容忍任何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民族来源、宗教或其他理由的歧视。

C. 另一套目的明确的规则

101. 拘留规则反映了国际法庭的独特性质以及出庭受审人员的民族混杂和他们可能被指控罪行的严重性质。已经致力研订了一套灵活办法,试求在待审被告的权利以及必须确保审判过程有关所有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之间保持平衡,同时又照顾到拘留的实际现有的设施。

1. 拘留犯

102. 拘留犯分为两个不同类别:还押待审人员,以及另一组人员,他们是经审判分庭定罪但等待上诉的人员或是经一分庭判定伪证或藐视法庭罪的人员。为了实际

的理由,所有经审判分庭判定犯有规约所确定任何罪行的人员均需留置拘留所内,期限容许达30天,以根据程序和证据规则发达上诉通知令,仅在上诉通知令发交之后方可转至其他机关。

2. 民族群体

103. 国际法庭特别注意到需将不同的民族群体分别拘留在较小型拘留处所之内的问题。拘留所专为国际法庭建成。其设计依据的是最现代的原则。一间囚房关一名拘留犯,内有作息空间和冲浴附带便所的设备。这种单人设施便于确保一民族群体拘留犯不遭不同民族背景其他人员所引致的危险。

104. 已做出安排,可在拘留犯自己要求或根据书记官长命令或拘留所所长命令之下,将拘留犯单独隔离,或是按群组隔离,以期最佳利用拘留所公共区。单独隔离须在密切的医护监督之下,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用以作为惩戒措施。群组隔离则必须平等对待所有拘留犯群组,并考虑顾及每一群组的拘留人数,同时须在国际法庭全面控制和监督之下。

D. 主要关切的问题

105. 由于拘留所大多数人员是由于还押、待审或可能等待上诉而被拘留,必须特别注意拘留的人权方面问题,至少是须符合实际空间限制和绝对安全的需要。

1. 拘留犯的权利

106. 拘留规则内刊载有诸如不得有任何理由的歧视和尊重个人宗教和道德信仰的权利的基本原则。

107. 每名拘留犯都有权获得一份其语文的拘留规则及任何其他规章以及使他能够认识自己在拘留所内权利和义务的其他资料,包括控告程序和惩戒规则。如果拘留犯不会讲或不懂国际法庭所使用语言或拘留所工作人员所使用语言,则可获口译

协助。国际法庭对有关拘留犯的资料保密,仅向拘留犯本人、其律师和书记官长特别指定的人员提供这些资料。

108. 拘留犯得获准自费与家庭亲友无限制通讯,但在所长认为必要的监督和时限之内。书记官长对于贫困拘留犯得授权支付合理的通讯开支。只有在司法执行或拘留所安全和程序的必要情况下方可限制探访。

109. 每名拘留犯都有权自由、没有限制地与其辩护律师交谈,必要时获口译协助。所长没有合理理由不得拒绝律师要求探访。与律师的所有交谈均属免责性质,会面和探访在拘留所工作人员听距以外进行。

110. 拘留犯有权自费获得书籍、报纸及他们想获取的任何其他形式文娱消遣,只要是无损于司法执行和拘留所安全和秩序的利益。拘留犯可收听无线电和收看电视,但在检察官要求限制若干拘留犯权限的特殊情况时则除外。

111. 提供有体育锻炼设施,并设有付酬志愿工作方案使拘留犯可在其囚房内或尽可能在公共区工作。

2. 安全

112. 拘留所的安全和秩序显然是首要关切和必要的。因此,所长可根据拘留规则关于例如使用武力和使用隔离室的具体规定或按照内部惩戒规章强制执行管制。对探访者得要求进行搜身和检查携带物品,如不从则可拒绝探访。这一规定平等适用于辩护律师和外交代表以及其家属。

113. 为了实际的理由,对拘留所内任何重大骚动将配合荷兰当局加以控制。但仅在极其特殊情况下并最多不超过两天得暂停施行拘留规则及其所规定保护的各种权利,以期国际法庭能同荷兰当局取得联系,采取在此时可能必须的行动。

E. 与东道国监狱的关系

114. 另一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是“监狱中的监狱”的概念,所有探访者包括律

师和外交人员均需遵守东道国监狱以及拘留所的进入程序。一些事项由荷兰监狱管理处负责,这些事项从实际方面的如提供食物、洗衣和医疗服务,到实质性方面的如对东道国监狱长有关影响国际法庭拘留犯的决定提出的申诉。这两方面责任密切协调,并已设法照顾到两套制度在日常基础上相符合。拘留所所长和东道国监狱长预期将随时彼此联系。

F. 拘留所管理当局

115. 拘留所所长为拘留所工作人员主管。他完全负责该所日常管理,仅受拘留规则具体规定约束。在大多数情形下,他向国际法庭书记官长作出报告,书记官长负责拘留所的行动和财政事项。影响拘留犯个人权利的事项得提交庭长作出决定,影响整个拘留所的问题则提交国际法庭由主持人员采取行动。

G. 视察

116. 参照当前关于监狱的控制和管理的想法,拘留规则中规定了由国际法庭任命的一个独立方面,进行经常、不加通知的视察,就拘留所内的情况向国际法庭作出报告。此外,主持人员得在任何时候任命国际法庭一名法官就拘留规则的执行的执行情况或任何特别方面向国际法庭作出报告。

六、设立书记官处及其职能

A. 导言

117. 国际法庭规约第17条规定设立书记官处,负责国际法庭的行政和为其提供服务。秘书长报告中特别详述了书记官处的职责,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a) 新闻和对外关系;(b) 编写会议记录;(c) 会议事务设施;(d) 印刷和出版所有文件;(e) 所有行政工作、预算和人事事务;(f) 充当国际法庭来往通讯的渠道(S/25704, 第90段)。

118. 国际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内载有关国际法庭有效职能运作的详细规定,并且规定了书记官处有关国际法庭行政和财政管理方面的具体任务。其中有许多条规则关于为国际法庭提供服务的事项,详述有关调查、审前程序、审判分庭程序和上诉复核程序。指定书记官处有关程序各阶段的一系列任务和责任。

119. 另一规定了书记官处职责的文书即联合国与东道国签订的总部协定。书记官处的任务是代表国际法庭在与荷兰当局密切合作下执行该协定的规定,以确保国际法庭在东道国的适当运作。

B. 行政和财政管理

120. 按照程序和证据规则,书记官处应协助各分庭、国际法庭全体会议、法官和检察官执行他们的职务。此外,在国际法庭庭长职权之下,书记官处负责国际法庭的行政和为其提供服务,并作为其通讯渠道(第33条)。

121. 作为国际法庭行政和财政管理的一部分,书记官处在财政和会计行政方面负有任务,并且正在发展能力提供档案和分发服务、会议和新闻服务、文件和图书馆服务和安全事务。在这方面,书记官处目前已有一批工作人员,他们过去几年来在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122. 由于负责行政和管理的副秘书长1994年5月间所采取建立符合联合国细则和人事政策的实际和快速人事安排决定,国际法庭工作人员的征聘和行政程序已大为增进。又由于国际法庭的职务非常专门,其工作人员的征聘是专门为国际法庭服务而不是为整个秘书处服务的,在这些安排下,授权书记官长以秘书长的名义任命D-1一级以下的工作人员以及终止任命该级以下的人员。在这方面,还应注意到在目前情况下,在大会核准的人员编制表内,初期任命可能只能是不超过一年的短期或固定期限。书记官处将尽一切努力确保国际法庭工作人员按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基础具有国际性质。

123. 书记官处不但负有任务组设一个具有联合国一般行政机构特色的机关,并

且还需按照国际法庭作为一个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有关其独特特性的一些特别规定。这种机构的基础设施和后勤工作涉及为房舍采取严格安全措施并且包括这样一种特点：需建造一间审判室（并陆续建第二、三间审判室）。设计适合国际刑事诉讼所有需要和规定的一间现代化的审判室必须调集许多的专门知识和专家人才，并且利用现代技术。审判室的设计需考虑到诉讼程序有关所有当事方包括证人的权利和权益以及预期新闻媒体和公众对审判的强大兴趣。此外，需为证人和受害人提供具体设施。已经有一个由书记官长主持的工作队负责国际法庭房舍的组建和建造审判室的准备工作。在这些事项方面，荷兰行政有关部门提供的建设性合作已证实帮助很大。

124. 书记官处深入参与的另一业务工作是建造拘留设施。已采取步骤，为拘留所提供足够的训练有素人员。对荷兰当局以及特别是在东道国监狱总监为拘留所荷兰籍人员以及国际工作人员的征聘和培训所提供的协助特表感激。

125. 书记官处执行有关国际法庭新闻和对外关系的任务。从国际法庭存在伊始的第一阶段起，新闻媒体就对其活动表示极大的兴趣，已做出相当努力来满足公众对这方面新闻的要求。国际法庭基础设施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新闻和信息设施，正做出必要准备工作以满足公众兴趣需求。并已任命一名新闻和信息干事。

C. 为国际法庭提供服务

126. 程序和证据规则载有许多规定，开列了书记官处在为国际法庭提供服务方面的任务。许多任务属法律和行政性质，需要司法诉讼特别是有关刑事诉讼程序事项方面的专家知识和经验。使用现代技术将可大力协助书记官处为国际法庭提供服务的活动。

127. 为国际法庭提供的服务包括有关在国际法庭档案内保存文件材料、履行有关国际法庭全体会议的职务和进行有关法官和各分庭程序和实质性质两方面的秘书处职务。作为其职能的一部分，书记官处具有有关允许辩护律师进入以及特别是有

关指定律师的复杂任务。这些任务现详述如下。

128. 书记官处是与各国特别是东道国通讯的渠道,以及与有关和主管机构、机关包括律师协会及其他的律师会社通讯的渠道。另一个特别责任是为受害人和证人提供保护措施以及为这些人特别是在性攻击案中提供辅导和支助。书记官处正在按照第34条的规定设立受害人和证人股(见上文第81条和下文第130-132条)。

129. 书记官处的一个重要责任来自于刑事诉讼性质。书记官处将须进行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则第五部分)交托给它的有关审前诉讼特别是公诉书的确认、修订或撤销、发出逮捕状、如无法执行令状则予诉诸的程序、被告的出庭的程序、还押拘留和暂时释放的程序以及录取证言的程序。书记官处有关审判分庭诉讼程序的任务(规则第六部分)包括有关“法庭之友”、召唤证人和专家、记录程序、藐视法庭情况程序以及财产归还和有关证人赔偿的程序。最后,应注意到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定书记官处还须履行若干与上诉程序、复核程序以及赦免及减刑方面有关的职能。

D. 保护、辅导和支助受害人和证人

130. 正在设立受害人和证人股,以期在他们与国际法庭发生牵连的各个阶段,对他们给予协助,特别是当为了向审判分庭提出证据的目的他们需在海牙出庭的期间。

131. 为使受害人和证人股正当运作,需要胜任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将适当加强注意按照第34(B)条规定雇用合格的妇女工作人员。受害人和证人股还将须依赖顾问人员的专才和专业经验,在特别需要他们的意见和协助时得召请他们出力。还预计要成立一个由不同训练和背景人士组成的咨询小组,定期开会向该股提供专业知识和指导。

132. 受害人和证人股的任务包括向与受害人和证人面谈的调查人员指示要点并且于必要可行时向他们提供保护措施和支助安排。在受害人和证人受传唤出席国际法庭期间,该股负有特别责任就审判的进行和证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任务和立场向受

害人和证人提供资料。该股还可在这个阶段提供心理协助和支助并与主管当局密切合作协调保护措施,包括适当住所设施。此外,该股还将在其他组织和机关协助下协调受害人和证人在审判后阶段回到自己国家或他处时对他们提供的保护和支助。为此目的,与受害人和证人股合作成立一个由其作为协调中心的国际援助网。只有在各国政府、专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和机关提供合作和援助之下,该股才能够有效地运作。

E. 指定律师

133. 秘书长在其报告(S/25704)中表示,国际法庭在诉讼程序所有阶段均须充分尊重国际公认的有关嫌犯或被告权利的标准,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这些标准载见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4条。规约第18和21条除其他外,规定嫌犯在调查期间和被告在起诉期间都有获自己选择律师给予法律援助的权利,贫穷者得获免费的法律援助,同样,程序和证据规则第42和55条也保证此一权利,并且授与书记官长根据第45条对其条件作出规定的责任。

134. 因此,书记官长与各位法官密切协商,编写了关于以下方面的程序指示:指定辩护律师、被指定律师的地位和行为、费用和付款的计算和给付以及咨询小组的设立。

135. 咨询小组属顾问性质,由书记官长所编写的被指定律师和律师协会的所建议的律师名单上抽签选出律师组成。咨询小组向书记官长或必要时向庭长就有关指定律师的问题提出咨询意见。

136. 书记官长在编写该指示时考虑到国际法庭的临时预算只包括临时助理人员有限的经费数额,法律援助的经费属该项之列。鉴于必须增拨经费用于支付国际法庭这方面的大笔开支,已将用于被指定律师的费用和付款限定在一定数目之内,用以支付执行这方面任务所产生的合理开支。

137. 因而须由书记官长在与庭长协商之下,审查要求指定律师的申请和提出此

种申请者的资产申报,作出相关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建立表示愿意担任被指定律师的律师名单,并且最后确定费用和授权付费。此外,视设备和设施可得情况,书记官长将向被指定律师提供执行他们任务的基本设备和设施。

138. 因此,为了司法的完善执行,并且为了尊重法律专业的职业道德规范,这方面大量的初步资料及有关决定交由书记官长负责。

七、检察官办公室人员编制及其活动

A. 导言

139. 1993年10月,安全理事会任命委内瑞拉公共检察官拉蒙·埃斯科瓦尔-萨济姆先生为法庭检察官。埃斯科瓦尔-萨济姆先生讲定他在1994年2月以前无法赴任。1994年1月20日,拉蒙·埃斯科瓦尔-萨济姆先生向联合国秘书长建议任命澳大利亚纳粹战争罪行小组主任为法庭副检察官。

140. 其后,埃斯科瓦尔-萨济姆先生通知秘书长说他不能担任法庭检察官。1994年2月21日,布卢维特先生以代理副检察官身分在法庭履行职务,直至任命检察官为止。

141. 布卢维特先生到达法庭后,即着手征聘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建立关于调查及继后起诉的结构、作业程序和系统。他还开始同有关人士、政府、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举行一系列会议。

142. 1994年7月8日,安全理事会任命上诉法庭法官兼南非防止公共暴力和恫吓调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戈德斯通先生阁下为检察官。

B. 检察官办公室的结构和运作

1. 有关人员编制的问题

143. 检察官办公室的作业独立于法庭法官、书记官和书记官处工作人员。然

而,检察官办公室与国际法庭其他部分之间在整个法庭的运作的行政、人员编制和其他有关事项上存在密切和合作关系。

144. 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挑选一直很耗时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若说整个法庭的成功在很大程序上视乎检察官办公室调查人员的才干而定,倒是一点也不过份的。拥有经验和资历高的检察官是重要的,但他们只是根据调查人员的收集的证据,向法庭陈述案子。如果起诉的证据不彻底完备或者准备得不充分,起诉失败的机会会很大。

145. 在选择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代理副检察官收到300件申请书以及世界各地人士所表示的兴趣。这些人大部分是律师,其中一些有许多起诉和调查经验的。在律师中,宁取有广泛诉讼经验的人士,特别是刑事案检察官或者那些在刑事调查和起诉方面有广泛经验的律师,其他律师是根据他们的国际或军事法经验选择的。所收到的律师申请书数量不少,可任命其中有经验和资格好的检察官。

146. 除了任命律师以外,此外,有可能从所收到的申请书和表示兴趣,挑选适当的候选人在检察官办公室的计算机、情报、行政和特别咨询部门任职。

147. 因此,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检察官办公室内几乎每一职位都有可能挑选适当的有经验和资格好的工作人员。但调查员一职是例外,法庭收到的这几百份申请书以及表示的兴趣中,只有极少数的候选人具备所需的经验,为了指认其他适当候选人,代理副检察官去信各国政府,订出必要准则,以及请指认并提名可能的候选人,通过由法庭直接雇用或者从政府借调的方式,予以任命为检察官办公室人员。若干政府对这两项要求反应积极,因此已有可能着手补实空缺。

148. 挑选工作人员的进程不仅耗时,而且使人沮丧,特别是在执行任用建议的方面。一旦完成初步甄选和建议进程,征聘工作人员方面出现延误,原因有好几个,本报告在其他章节对此已有讨论。法律独一无二的性质为纽约各个有关的联合国办公室造成许多困难。此外,法庭缺乏长期的预算承诺,以及无法为可能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在本国职位相当高级且稳定——提供长期合同,是一项重大的妨碍,短期合同得不

到普通联合国任用一般享有的福利,因此,若干适当的候选人最终婉拒征聘,而大多数同意搬家至海牙的工作人员在收入方面会有损失。联合国无法给予检察官办公室那些受到短期合同聘书不利影响的雇员例外待遇,因为这完全超出法庭所能控制的范围。

149. 经法庭再三要求后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征聘过程在五月底有了大幅度改进,纽约联合国授权书记官直接在海牙招聘人员。

2. 检察官办公室的结构

150. 大会所核准的法庭预算为检察官办公室编列67个职位,包括检察官本身。在此一预算人员编制的限制之下,代理副检察官建立了检察官办公室的结构,一共有四科。

151. 四科中最大的是调查科,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和资历浅的调查员、律师、情报分析员、顾问和支助工作人员组成。该科负责进行所有调查,包括外地调查在内。

152. 第二科是起诉科,共设六个职位,即三名经验丰富的资深审判辩护律师、两名法律顾问/研究员以及秘书支助,这一科负责对调查科人员编写并提交的起诉状进行独立审查,为起诉书定稿以及在调查科检察人员的协助下,与检察官和副检察官一起,向法庭的法官陈述起诉。

153. 特别咨询科是检察官办公室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它由三位专家和一位联络官组成,这三位专家的专长分别是:国际法、军事法和战争法;前南斯拉夫法律;包括管辖系统和战争规则在内的军事;与巴尔干有关的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这一科将就上述事项向检察官办公室各科提供特别的专家咨询和培训,从而为起诉科和调查科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和资料。

154. 检察官办公室的其余一科是行政和记录科,负责检察官办公室的电脑系统以及收发、处理检察官办公室所收到或提出的所有一切资料、证据、声明和其他记

录,并将之归档。

155. 代理副检察官已为检察官办公室征聘各职位的工作人员,仅有调查员职位由于缺乏候选人而从缺,大体来说,这些工作人员获得十二个月的法庭联合国雇员聘书,这一期间限制是大会所施加的现有预算限制,假定每一职位的众议员有效率和妥善地履行其职责和任务,拟将这些合同续约。已为检察官办公室内每一职位编写职务说明,细列与每一职位有关的主要职责和任务。另编写了进一步的单独指导方针、资料、指南以及程序手册,以供检察官办公室每科指示和援助之用。

3. 与其他机构合作的需要

156. 相当时候以来,很明显的是,分配给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人数不足以进行所有必要的调查任务,因此,有必要依靠各国政府和其他机构的援助。有两个国家已同意向检察官办公室提供工作人员,包括调查员和律师。法庭鼓励所有政府作出类似许诺,这种借调人员将使检察官办公室的规模增大,足以执行一个更广泛、彻底和效率更高的调查策略,此外,要进行面谈的有数以千计的可能证人,检察官长办公室需要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提供充分合作和援助。

C. 同其他机构和国家的关系

1. 专家委员会

157. 在法庭设立后不久,法官有机会同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所设专家委员会主席谢里夫·巴西欧尼先生会晤,在1994年2月25日,代理副检察官和法庭的其他工作人员在海牙同巴西欧尼先生和委员会其他成员举行了会议,会上详尽地讨论了委员会的工作和调查结果,并且将若干材料移交检察官办公室。其后,代理副检察官长访问了委员会在日内瓦的房屋。一位工作人员也访问了芝加哥,以便进行检查并且接受有关委员会电脑数据库的指示。代理副检察官也同委员会大多数专员和工作人员举行了会议。

158. 在1994年4月间,检察官办公室得到委员会数据库副本。其后,在1994年5月,法庭收到芝加哥送来的所有文件;这些文件构成数据库的资料基础。到了1994年5月底,已开始行动,用检察官自己的电脑系统检视这些文件。这一进程最初发生一些技术困难,但结果达成将芝加哥的数据库同检察官的电脑系统结合起来,检察官办公室同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关系密切。

2. 同各国的接触

159. 若干政府已进行逮捕,并且开始调查关于被捕人士曾在前南斯拉夫犯下战争罪行或危害人类罪行的指称。此外,还对一些未遭逮捕的其他人进行调查。

160. 检察官办公室负责监测所有这种调查以及任何导致的起诉,以便在适当情况下,法庭可行使它的管辖权。为了支助监测进程,审判观察员得出席可能属于法庭管辖范围的起诉。

161. 代理副检察官同许多国家的大使会面,所有这些国家毫无例外保证怀有诚意和合作。在1994年4月11日,代理副检察官写信给各国政府——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政府则例外——这封信交与纽约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观察员代表团的常驻代表,这封信不仅谋求各国政府合作,并且列出若干政策事项,请予援助,包括提名调查员的候选人以及将与战争罪行有关的任何证据提交法庭。

3. 同非政府组织的接触

162. 代理副检察官也同那些热衷与法庭合作并提供援助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十分有用并且令人鼓舞。为了试图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正式化,编写了一项声明供非政府组织参考,送交每一个对法庭工作有兴趣或者在与法庭有关的领域积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项说明列出非政府组织能协助检察官长办公室工作的各种方法,其中包括作为审判观察员、提供专门性服务等等。

4. 与大众媒介的接触

163. 代理副检察官试图同大众媒介打交道,以促进对法庭的积极态度,并且提供足够的资料,但又不揭露作业事项,以便利准确和负责地报道法庭活动,特别是检察官办公室的活动。

D. 结束语

164. 尽管安全理事会于1994年5月设立了法庭,一直到1994年2月任命布卢维持先生为代理副检察官后,才开始设立检察官办公室自从那时以来,尽管预算考虑和招聘问题造成延误,检察官办公室已在作业。既然已任命了检察官,预期在1994年底以前将准备妥当可提出起诉。

第三部分

联合国会员国的行动

八、东道国的合作

165. 自《国际法庭》成立之初,荷兰当局,特别是外交部和司法部即给予了多方的合作。

166. 特别是荷兰当局,为《国际法庭》努力寻找合适的房地,协助与房地主进行谈判,商讨租赁和修整房屋以适应《国际法庭》之需要,安排在一监狱中建造一拘留所以供受审者使用等事项,并与联合国进行《总部协定》的谈判。此外,荷兰当局还为《国际法庭》,法官及工作人员在火车上的必要安全措施作好准备。他们又采取步骤,确保审判开始后受害者及证人的安全。

167. 毫无疑问地,《国际法庭》若没有荷兰当局的协助与支持,是不可能为今后的司法行动建立必要的具体基础的。《国际法院》要向荷兰当局表示感谢之意,并

深信还可继续依靠其稳固不懈的支持。

九、总部协定

168. 在国际司法组织与荷兰当局持续的良好关系的传统下联合国与荷兰王国签订了一项《总部协定》，该协定正式确立了《国际法院》在海牙的存在。《协定》是1994年5月27日由双方提出，暂时从签署日期开始生效，并将在一切生效的必要法律条件满足后正式生效。

169. 《总部协定》共约29条，大多是关于外交或国际关系的正常事项。《国际法庭》在东道国内具有充分的司法性格，《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总公约》)》¹¹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¹²均可适用。《国际法庭》的房地、档案和文件均为不可侵犯，任何时间均置于《国际法庭》的控制之下。《国际法庭》享有依照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具有的豁免权。其法官、检查官和书记官具有外交使节的地位。《国际法庭》的其他官员享有《总公约》规定的特权与豁免权，资深工作人员具有同级别外交工作人员的地位。

170. 《总部协定》的独特之处是在它包含若干规定反映了《国际法庭》的具体要求。这些要求特别是有关被告、顾问和证人、进入和在荷兰境内的移动。东道国已同意对进入该国的嫌犯或被告，从移往法院时起，到释放或宣告无罪后15天期间，不对他们行使刑事管辖权。应法院传讯或要求出席作证的人也享有同样的豁免。在《国际法庭》中所有出庭的人都享有无阻拦地进出东道国和在其境内的权利，陪伴证人的人亦同。

171. 嫌犯或被告的顾问在荷兰境内有独立行使其工作的充分自由，包括免于移民限制的自由。顾问工作所需的一切有关文件皆不容侵犯，它们在正式发挥其功能时享有充分的刑事和民事管辖免。

十、法律执行的生效

172. 安全理事会1993年5月25日第827(1993)号决议执行部、第4段规定“所有国家应”与《国际法庭》及其机关“充分合作”并“应‘根据国内法’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执行《规约》的规定”并遵守“初审法庭提出的协助要求或发布的命令”。《规约》在第29条确立了各国《国际法庭》在“调查和起诉被控犯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人”方面的合作。程序与证据规则第58条重申此一原则并肯定表明各国根据《规约》的义务“应超越任何法律障碍,向《国际法庭》交出或移送被告”。此处法律障碍系指国家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障碍。

173. 在第一届会议结束时,《国际法庭》庭长于1993年11月30日的信中提请秘书长注意,会员国必须不仅在其国内法律体系中指定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处理《国际法庭》的任何要求,而且需通过必要的法律或规范性规定以体现《法庭规约》。

174. 《国际法庭》通过了其《程序及证据规则》后,庭长于1994年3月14日致送一份通知给各会员国代表。他在这份通知及其后的通知中强调了关于移送嫌犯及被告的规定的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不要将这种移送适用于有关引渡的类似的现有法律或双边公约。移送被告给《国际法庭》不属两国间法律关系范围的问题:它是每个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应有的一般合作的态度。

175. 若干国家指定一个主管当局接受《国际法庭》的要求:司法部(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土耳其);检查长办公室(挪威);外交部(斯里兰卡、瑞典、联合王国);驻荷兰大使馆(美利坚合众国)。

176. 依据目前得到的资料,通过法律执行《国际法庭》规约和程序及证据规则》的国家如下:芬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和瑞典。

177. 有些国家表示不久的将来有意通过这类法律,其中有些已函告《国际法庭》目前正在审议一份总的大纲草稿,这些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法国、新西兰、斯里兰卡、瑞士、土耳其、联合王国和美国。美国已就提交嫌犯问题

起草了一项与《国际法庭》的具体协定：一旦缔结了协定，便必须执行法律。

178. 一般而言，大多数的法律和规章的文字均表示，将以特设性的法律制度与《国际法庭》合作。

179. 关于《国际法庭》与国家当局间共同管辖权方面，已生效或提议的法律确定了《国际法庭》决定的约束力，它又主张在调查和诉讼两方面《国际法庭》的优越性的原则，但在某些国家则视其具体安排而定（即，国家当局作出宣告性的判决或决定以中断诉讼）。

180. 大多数国家已确立程序处理移送的要求，由指定的国家法庭进行（即，海牙的区域法庭，马德里的国家法庭（Audiencia Nacional），安卡拉的高等刑事法庭，巴黎和罗马的上诉法庭）。有少数国家规定有特设程序，另一些国家则计划对该国有关引渡的规定适用作必要更改。但只限于程序，且不能按适用于引渡的同样限制移送被告到《国际法庭》（即非引渡国民或政治犯被告）。在某些国家，还订有关于国家法庭对《国际法庭》要求移送的决定作出申诉或审查的规定。

181. 有些国家对执行《国际法庭》传下的判决即构成适当的领事证书程序，其根据的理由是该事项是由东道国法律掌管。

182. 有些法律条文或草案也包括保证豁免及自由移送被《国际法庭》传召的被告、证人或专家在这些国家过境的规定。这些规定以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保障被移送者的安全，对移送的被告则预防其逃逸。

十一、各国的自愿捐款

183. 大会在其1993年9月14日，第47/235号决议中请会员国及其他有关各方向《国际法庭》提供现金和服务以及秘书长能接受的其他形式的捐助。

184. 截至1994年7月15日，下列各国为支助《国际法庭》捐助了基金共\$3 208 900元：

\$

加拿大	168 279.65
匈牙利	2 000.00
爱尔兰	6 767.56
列支敦士登	2 985.00
马来西亚	2 000 000.00
纳米比亚	500.00
新西兰	14 660.00
巴基斯坦	1 000 000.00
西班牙	13 725.16

185. 此外,下列各国向信托基金作了认捐:

\$

爱尔兰	21 428.57
意大利	1 785 714.20
挪威	130 000.00

186. 美国向《检查官办公室》认捐实物--电脑系统,最高价值300万。此外,为《检查官办公室》派出22名专业工作人员,任期两年。

187. 联合王国作了实物捐助:电脑设备,价值约2万英镑。

188. 瑞典同意另派两名调查员到《检查官办公室》。

第四部分

结论意见

189. 1945年11月21日,美国检查长罗勃特·杰克逊先生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开幕辞中指出,在创设不到八个月之前,该军事法庭充分运作。他说“不到八个月前,在座诸君处身的这所法庭还是德国纳粹军队手中的一座敌人的城堡。不到八个

月前,所有我们的证人和文件都还在敌人手中。法律尚未编纂,诉讼程序尚未建立,法庭还没有诞生,房屋尚未建造,数百吨重的德国官方文件尚未检查,负责检控的工作人员尚未召集,几乎所有的现在的被告还在逍遥法外。”¹³

190. 虽然,环绕纽伦堡法庭创立和工作的历史环境已同现在的法庭的创立背景大不相同了。但是不能不看到,令人遗憾的是,通过本报告的时间,即《国际法庭》成员展开工作以来已有八个月,这个法庭尚未能充分完成其根本使命,即,主持司法正义。

191. 目前阻碍《国际法庭》开审的主要的各种实际、财政和其他性质的困难已载在上文(见第28-42和148-149段)。

192. 但是,在秘书长的大力支持,许多国家,特别是东道国的合作下,在《国际法庭》杰出的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下,尽管他们力量尚单薄,已为《国际法庭》的使命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国际法庭》程序的基本法律框架很快地确立(《程序和证据规则》及《指派顾问守则》)。现已觅妥《国际法庭》的适当房地,进行了修整以适应司法程序的需要。同时派定了一名代理书记官长,在书记处中配置了工作人员,但尚未满额。此外,确立了受害人及证人股的核心工作。审判前负责拘留被告的拘留所已经建立,《国际法庭》也通过了必要的拘留规则。

193. 检查官办公室工作人员逐步安置,由于一系列的事件和困难,直到1994年6月才实现,希望在今后几个月,检查官能开始发出起诉书供法官审查。但不应该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在审判开庭以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必须批准一份正式的预算。检查官办公室工作人员尚未满额,设备亦未齐全,还需要一切必要的基础结构和现代技术。《国际法庭》的审判庭(这是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唯一列入预算的。)尚未完工。该庭预期将在10月底竣工。

194. 《国际法庭》为了迅速、圆满完成其使命,还必须赖各国的继续合作,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更多的支持。《国际法庭》深信这种合作与支持将继续下去,使《国际法庭》能很快地发挥其具体作用,努力减轻前南斯拉夫人民的苦难,对那里犯

罪的人给予公正的处分。

195. 建立《国际法庭》这个新颖而具实验性的机构是世界社会的巨大进步,因为这个机构要求公正辨明和执行持续的人道要求。这些要求是国际社会首次于1899年在海牙宣布。那一次是一位俄国代表(原籍爱沙尼亚)费德·费奥多罗维奇·马尔顿斯。在《关于陆上战争的法律与习惯》的海牙公约的序言部分中加入了“人道法律”(Les Lois de l'humanité)的著名辞句。其后,第二次大战终盟军在纽伦堡和东京执行了这些法律,虽然当时是以单方面方式生效,即战胜者对战败者实施的。其后,人道法律即在国际宣言中宣布了。《世界人权宣言》⁷和《防止和惩办种族灭绝罪行公约》¹⁴,是1948年联合国大会中通过的其中重申和阐释了人道法律。1949年,国际法院在案 Corfu Channel (Merits) 中强调“在和平时期,人道的基本考虑甚至比战争时期更加严格”¹⁵但自1946-1947以来,还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被赋予这样崇高、艰巨的任务,去追究践踏人道者的罪行。世界社会这样长期的沉默是不奇怪的,弗兰西斯·培根先生早在1621年说过“不论是时间或空间,都被浪费和抛弃了”¹⁶

196. 联合国多年以来累积了大量告诫各国与个人有关人道行为的国际标准,现在确立了一个把这些标准付诸试验,化为现实的机构。联合国这一整套崇高、遥远的理念将开始对人类产生影响:所有犯有强奸、酷刑和大屠杀罪行的个人将因他们不可原谅的,罔顾人的尊严的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通过《国际法庭》这些规则将从抽象信条转变成不可逃避的命令。同样地,联合国多年以来庄严通过的,带有劝谕性质的关于会员国对拘留犯待遇的国际标准,现在将通过《国际法庭》,在联合国的控制和监督下,约束第一个关押拘留犯的国际监狱。

197. 建立《国际法庭》可能成为世界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如果《国际法庭》经证实能有效而冷静地作业,且各国和联合国机构今后也能进行必要的合作,那么它可能开辟一条实现国际正义,世界社会和平的新途径。

198. 1993年11月17日,法官们庄严承担要公正、本着良心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坚定承诺,要尽最大的努力和能力完成任务。他们这样作,不

仅因为他们要承担起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机构,即大会选出他们并赋予了他们的责任,而且也出于对前南斯拉夫人民的所有的道义责任。《国际法庭》热切希望通过自力的手段,在这片惨遭摧残的区域内,恢复人道与和平的条件,减轻那些仍在武装暴力和野蛮势力下受难者的痛苦与悲伤。

注

¹ B.V.A. Röling, "The Law of War and the National Jurisdiction Since 1945", in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Collected Courses, 1960-II p.354(Leyden A.W.Sijthoff.1961)。

²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Déportés et Internés Résistants et Patriotes and others v. Barbie, Judgement of 6 October 1983, Cass.crim., RGDI, 1984, p.508(in French), (1985)78 I.L.R 125.

³ Röling, op cit., p.356.

⁴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Nuremberg, 1947), vol. 1, p.218。

⁵ G.W.F.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1821, para.130.

⁶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1, p.8(London Agreement of 8 August 1945).

⁷ 大会第217 A(III)号决议。

⁸ 大会第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⁹ 大会第44/128号决议,附件。

¹⁰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1, p.221。

¹¹ 大会第22 A(I)号决议。

¹²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0卷第7310号。

¹³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vol.2, p.100。

¹⁴ 大会第260 A(III)号决议。

¹⁵ Corfu Channel Case(Merits)1949 I.C.J.4, at 22.

¹⁶ F.Bacon, *Norum Organum, sive Indicia Vera de Interpretatione Naturae* (New organ.or true indicia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1620. sect. I, para.78. (Sunt enim non minus temporum quam regionum eremi et vastitates).

附 件

国际法庭的组成

A. 1994年7月国际法庭的法官

安东尼奥·卡塞塞(意大利), 庭长

卡塞塞法官自1975年起担任佛罗伦萨大学政治学系国际法教授, 自1987年起担任佛罗伦萨欧洲政治学院国际法教授。他曾多次代表意大利政府参加联合国关于人权问题的会议, 以及关于武装冲突人道主义法的日内瓦外交会议(1974-1977年)。卡塞塞法官在去年当选为本法庭法官之前, 是欧洲委员会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侮辱待遇委员会主席。

伊丽莎白·奥迪奥·贝尼托(哥斯达黎加), 副庭长

奥迪奥-贝尼托法官是本法庭两名女法官之一, 曾两度担任哥斯达黎加司法部长(1978-1982和1990-1994年)。她又是哥斯达黎加大学的法学教授, 并长期执行私人律师业务。此外, 自1980年起, 奥迪奥-贝尼托法官一直参加联合国的人权工作队, 包括担任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和歧视的特别报告员, 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董事会的拉丁美洲代表。

阿道佛斯·卡里比-怀特(尼日利亚)

卡里比-怀特法官除担任尼日利亚最高法院法官之外, 历任尼日利亚一些仲裁和司法调查团团长, 包括平民骚乱调查法庭庭长。他有近20年的司法经验, 包括最高法院经验10年, 又有司法部的经验。

加布丽埃勒·柯克·麦克唐纳(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唐纳法官担任法官、法律教授和律师积有近30年经验。麦克唐纳法官曾担任联邦法院院长近10年之久, 执行民权法律业务, 并在美国一些法学院担任教授。

李浩培(中国)

李法官曾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和北京大学国际法兼任教授。李法官除在中国担任

教职之外,又是国际法学院和常设仲裁法院的成员。他曾数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委员会,是出席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法会议的中国代表。李法官又是第一部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起草人。

朱尔·德舍纳(加拿大)

德舍纳法官是加拿大战犯调查委员会主席。德舍纳法官除了曾担任日内瓦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成员和加拿大出席人权委员会代表团顾问外,又担任魁北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他执行律师业务和法官共积有近50年的经验。

尼尼安·斯蒂芬爵士(澳大利亚)

斯蒂芬法官于1950年代初开始执律师业,1970年被任命为维多利亚最高法院法官,审理民、刑事诉讼案件,直到1972年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法官为止。1979年斯蒂芬法官被任命任职于枢密院。后来担任其司法委员会成员。1982年,他被任命为澳大利亚总督,直至1989年为止。

鲁斯塔姆·锡德瓦(巴基斯坦)

锡德瓦法官于1951年开始执行律师业务,为本法庭带来40多年的经验。他拥有民、刑事诉讼经验,又参加代表各州在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师团。1978年锡德瓦法官被任命为法官,从此一直服务于拉合尔高等法院;1989年至1992年他担任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法官。锡德瓦法官除有司法经验之外,1968年又由巴基斯坦提名列入联合国法律和其他领域专家名册。

乔治·阿比-萨阿卜(埃及)

阿比-萨阿卜法官自1963年起任教于日内瓦国际研究高级学院,1969年起担任国际法教授。他是国际法学院的成员,1972年政府专家会议埃及代表团团员,1974-1977年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问题外交会议埃及代表团团员。他在一些国际诉讼中担任国家律师或仲裁人,并曾两度担任国际法院专案法官。

拿督·维拉·拉尔·沃赫拉赫(马来西亚)

当选本法庭法官之前,沃赫拉赫法官是马来西亚高等法院法官。他代表马来西亚出席各种国际会议:1969年维也纳联合国条约法会议,1974年加拉加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5年拉各斯英联邦法务部长会议。沃赫拉赫法官又代表马来西亚参加关于划分领海界线 and 大陆架以及关于渔业的国与国间谈判。

克洛德·约尔达(法国)

约尔达法官于1994年初被任命为本法庭法官,替代因健康不良辞职的前任法国人法官-勒富法耶·德科斯蒂法官。1985年至1992年约尔达法官担任波尔多上诉法院总检察长,后来又担任巴黎上诉法院总检察长,因此拥有丰富的检察官经验。以前,他是司法部司法局局长,曾在国家法官学校任教六年。

B. 检察官

理查德·戈德斯通(南非)

戈德斯通先生,1963年至1980年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接着被任命为德兰士瓦最高法院法官。1989年,他被任命为南非最高法院上诉庭法官,自1991年起,戈德斯通先生担任防止公开暴力和恫吓调查委员会主席。

C. 书记官

特奥多尔·范博芬(荷兰)

范博芬先生是法律教授,1970-1975年是人权委员会荷兰代表,1975-1976年和1986-1991年是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成员。他又是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1977-1982年他担任联合国人权司司长。

- - - - -